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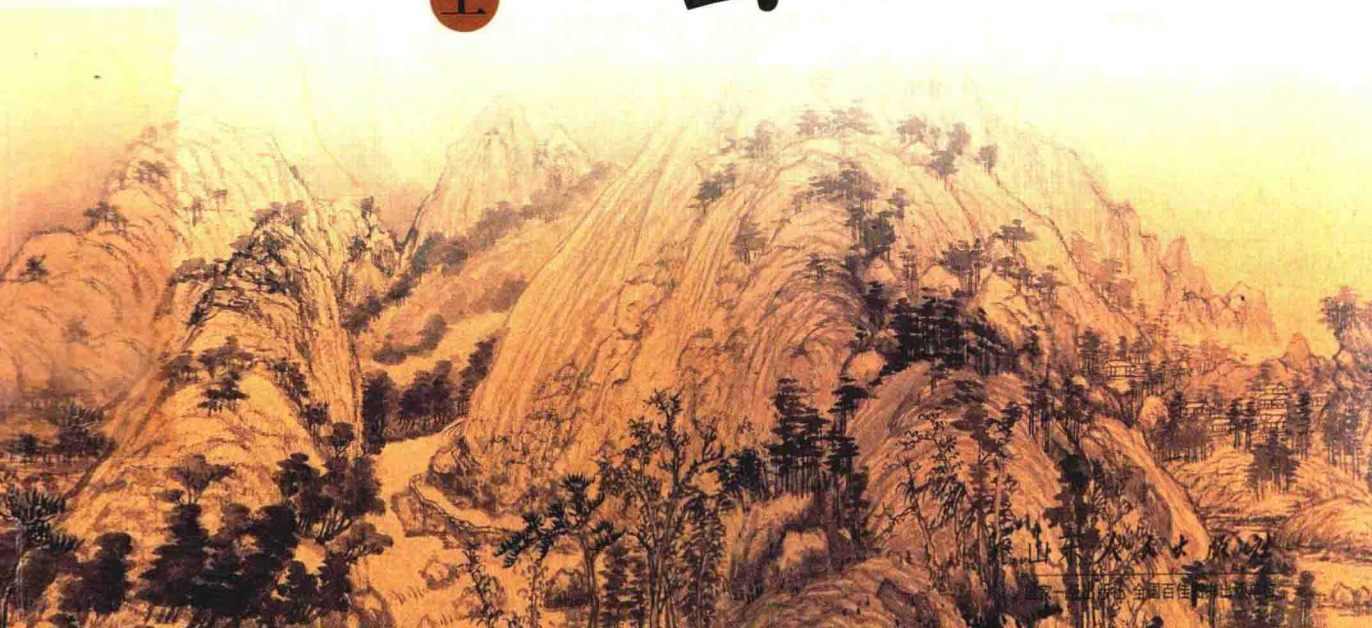


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编

主编 颜炳罡 副主编 徐庆文 蔡祥元

# 儒家文明论坛

(第二期) 上



# 儒家文明论坛

(第二期) 上

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编

主 编 颜炳罡

副主编 徐庆文 蔡祥元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家文明论坛·第二期/颜炳罡主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209 - 09685 - 0

I. ①儒… II. ①颜… III. ①儒家—文集  
IV. ①B222. 0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6038 号

### 儒家文明论坛 (第二期)

颜炳罡 主编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84mm × 250mm)

印 张 36.5

字 数 7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

ISBN 978 - 7 - 209 - 09685 - 0

定 价 76.00 元 (全两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儒家文明论坛》 第二期

|       |     |     |      |     |
|-------|-----|-----|------|-----|
| 学术委员会 | 杜维明 | 陈 来 | 刘大钧  | 王云路 |
|       | 王学典 | 杨国荣 | 舒大刚  | 万俊人 |
|       | 朱小健 | 安乐哲 | 池田知久 | 陈 炎 |
|       | 陈卫平 | 杨世文 | 杨朝明  | 李景林 |
|       | 郭齐勇 | 崔英辰 | 黄俊杰  | 赵生群 |
|       | 董 平 | 傅永聚 | 景海峰  | 颜炳罡 |
| 编 辑 部 | 颜炳罡 | 杜泽逊 | 邢占军  | 徐庆文 |
|       | 蔡祥元 | 韩 悦 | 蒋聚缘  | 张 玟 |

## 编辑说明

由国际历史学会(ICHs)主办、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承办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2015年8月23日至29日在济南举行。作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济宁卫星会议——儒家文明与当代世界,由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于2015年8月27日在儒家文明的圣地曲阜举行。山东是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故乡,是儒家学派的诞生地,至今仍有保存完好的、享誉全球的作为儒家文明载体的世界文化遗产:孔庙、孔府、孔林。有鉴于此,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特设“儒家文明与当代世界”济宁卫星会议。邀请海内外在儒家文明领域造诣精深的学者发表学术演讲。本次会议重点研讨了儒家文明的历史、儒家文明与当代世界、儒家文明的未来发展等问题,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与前瞻性。本文集即是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参加会议的学者中,有的学者没有提供论文,有的学者的论文已经在其他地方发表,有的学者不同意收录于此文集中,我们均尊重作者意见,没有收录。

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2015年9月5日

# 目 录

## CONTENTS

### 壹 儒家文明的历史考察

|     |                                              |     |
|-----|----------------------------------------------|-----|
| 陈 炎 | 儒家文化的历史生成 .....                              | 3   |
| 杨朝明 | 王纪东 “中道”观念与中国史学传统 .....                      | 22  |
| 沈顺福 | 试论传统儒家制度的伦理基础 .....                          | 33  |
| 陶新宏 | “生生”：儒家对生命的诠释 .....                          | 44  |
| 王 正 | 先秦儒家道德哲学中的群己之辨 .....                         | 53  |
| 陈乔见 | 春秋时代的伦理与道德 .....                             | 62  |
| 巩宝平 | 论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中的理性意蕴 .....                        | 86  |
| 刘延常 | 解读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br>——以鲁文化研究为例 .....              | 91  |
| 刘 培 | 新学独尊与两宋之际的颂美辞赋 .....                         | 94  |
| 卞玉山 | 古兖州夏丘城由鲧筑成考 .....                            | 120 |
| 侯乃峰 | 由包山楚简的司法实践看《论语》的“直躬证父”与“父子互隐” .....          | 137 |
| 李昉聪 | 孔子“复礼”别解<br>——从周礼在春秋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看孔子“复礼” ..... | 141 |
| 刘悦笛 | 孟子道德动机中的“情”之论辩<br>——从比较哲学的观点看 .....          | 151 |
| 王曰美 | 论司马迁悲剧人生的二律背反 .....                          | 162 |
| 曾振宇 | 自由：道家庄子与儒家程伊川的不同思考 .....                     | 172 |
| 韩 星 | 儒家文明的经济维度<br>——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及其现代价值 .....        | 198 |

|         |                                             |     |
|---------|---------------------------------------------|-----|
| 翟奎凤 刁春辉 | 《礼运》“大同”与近现代中国理想社会的追寻<br>——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向及大同儒学构想 | 210 |
| 洪光华 刘节的 | “抽象继承法”<br>——儒家文明传承与发展的方法论                  | 234 |
| 朱 浩     | 由《辨性》篇论章太炎之“心性”观                            | 249 |
| 何卓恩     | 为“新儒家”做注释：从徐复观与殷海光、钱穆的冲突说起                  | 272 |
| 梁奋程     | 牟宗三、罗尔斯与哈伯玛斯论政治正当性                          | 285 |

## 贰 儒家文明与当代世界

|     |                                         |     |
|-----|-----------------------------------------|-----|
| 景海峰 | 在对话中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                           | 297 |
| 吴 光 | 论儒家文明的内涵、根本精神、核心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 302 |
| 郭 沂 | 中华普世价值与未来人类文明                           | 313 |
| 刘源俊 | 从现代角度看孔子思想                              | 328 |
| 李晨阳 | “人类世”新人本主义的文化根源：儒家视角                    | 336 |
| 成积春 | 王京传 儒家文化与山东省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研究               | 344 |
| 张昆将 | 德川学者对孔子思想的异解与引申                         | 360 |
| 李瑞全 | 儒家文明与世界和平：唐君毅与康德论永久和平之道                 | 374 |
| 张秋升 | 早期儒家的仁爱之情论及其当代价值                        | 393 |
| 陈卫平 | 儒学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经验                        | 405 |
| 明成满 | 儒家学派家庭德育环境思想及其当代借鉴研究                    | 410 |
| 高玮谦 | 论儒学在当代华人社会的开展之道<br>——从百年来读经教育的存废与复兴谈起   | 420 |
| 王 征 | 凭借儒家理念进行现代治理的成功样板<br>——李光耀政府借鉴儒家理念治国的启示 | 437 |
| 张 鹏 | 中国梦的理论建构与孟子治国思想的当代回响                    | 444 |
| 王红霞 | 坚守·变通·创新<br>——从孔德成婚礼看儒家礼俗的当代价值          | 450 |

## 叁 儒家文明的未来发展

|     |                               |     |
|-----|-------------------------------|-----|
| 杨国荣 | 儒学的历史形态与未来走向<br>——以“仁”与“礼”为视域 | 461 |
|-----|-------------------------------|-----|

|      |                                                  |     |
|------|--------------------------------------------------|-----|
| 颜炳罡  | 当代儒学创造性转化的四种方式与路径 .....                          | 471 |
| 谭世宝  | 守先待后：汉字及孔子道德文化财富的返本创新<br>——中华国学承传的历史与未来新研究 ..... | 484 |
| 赵法生  | 国教之争与康有为儒学复兴运动的失败 .....                          | 517 |
| 吕厚轩  | 20 世纪 30 年代的反尊孔话语对当下儒学复兴的启示 .....                | 530 |
| 关长龙  | 幽赞明数而达乎德<br>——《敦煌本数术文献辑录》前言 .....                | 539 |
| 贾海生  | 封建命书的真伪存亡 .....                                  | 549 |
| 王永超  | 古书校释应重视理论语言学指导 .....                             | 556 |
| 东野长德 | 子午与司南 .....                                      | 567 |

# 壹 儒家文明的历史考察



# 儒家文化的历史生成

陈 炎 山东大学

**摘 要** 出于治理黄河的需要，华夏先民们在没有铁质农具，从而私有财产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建立了早期的国家政权。尽管夏朝废除了早期氏族社会以推举、禅让来延续权力的民主制度，形成了以血缘因袭王位的世袭制度，但其内部的权力继承制度尚不稳固，其血缘关系也很难渗透到十一支姒姓氏族以外的部落群体。继之而起的商朝将游动不拘的部落联盟演变为相对稳定的方国联盟，从而加强了地域—血缘的稳定联系，并用制度化的血缘继承关系改变了夏代“有王与无王”的混乱局面。但商朝诸方国之间的血缘关系仍然是外在的，其内部的权力继承尚存在“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的两种形式。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在充分吸取夏、商两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并通过分封诸侯的形式使王室的血缘关系渗透到整个国家的势力范围，再通过“制礼作乐”来维护和巩固这种“家国一体”的社会形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亲子血缘关系出发，以“爱有差等”来论证“礼有别异”的儒学诞生了。

**关键词** 血缘 国家 宗法 礼乐 儒家 文化

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儒家文化的基础是家族。家族作为一个血缘单位，在迄今为止的任何文明社会中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然而研究结果却告诉我们，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家族的社会地位是不尽相同的，其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也并不一样。伏尔泰就曾指出，中国“是唯一把一切都建立在父权基础上的国家”<sup>①</sup>；黑格尔也认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sup>②</sup> 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认识的逐渐深入，这种观点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如恩格斯的“家内奴

① [法] 伏尔泰著：《哲学辞典》，王燕生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340 页。

② [德] 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2 页。

隶制”理论、韦伯的“父系家长制”理论、许烺光的“二次集团选择”理论，都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家族社会的特点。从这一意义上讲，家族血缘关系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核心要素，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标志性特征。“家族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单位，也是中国文化的微缩景观。毫不夸张地说，谁若理解了中国的家族血缘关系，谁就掌握了打开中国文化之门的钥匙。”<sup>①</sup>

然而，尽管中外学者对此问题多有分析，且已基本达成共识，但这些分析大多是从静态的社会现象入手的，这些共识也主要是基于中国文化的宏观特征。因此，要对中国古代家族与社会关系有着更加深入地理解，我们的研究有必要从静态转向动态，由宏观转向微观：去详细地梳理这一文化现象生成的历史，去认真地考察这一文化现象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 —

谈到人类不同文化的起源问题，人们常常会引用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提到的“轴心时代”的观点，即将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印度文化、儒家文化的形成归结为公元前5世纪前后所出现的那些著名的思想家。然而细想起来，“轴心时代”的概念是相当粗疏的，且不说雅斯贝尔斯将以婆罗门教为主体的印度文化归结为释迦牟尼的做法已犯了常识性的错误，而且他将某种文化归结为某几个思想家的做法也难免有些简单化的嫌疑。其实这种观点也并不新鲜，我们宋代的古人不就有过“天不生仲尼而万古如长夜”的慨叹吗？然而慨叹归慨叹，研究归研究。我们的研究不仅要准确地判定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对儒家文化所做出的实际贡献，而且要深入地说明，为什么偏偏在华夏文明的土地上会出现孔子这样的思想家。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随着地下考古资料的发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各文化板块形成的历史较之所谓“轴心时代”更为久远。也就是说，在雅斯贝尔斯所称颂的那些人物诞生之前，世界各主要文化区域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且各具特性的文化制度。正如吕思勉所言：“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中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sup>②</sup> 因此，要寻找儒家文化生成的动因，我们需要越过孔子而上溯三代，在夏、商、周的历史中寻找文化的秘密。

中国古代的历史年表始自夏代，但夏代是什么样子，其实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因为夏代没有文字，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史。根据文献传说和出土文物，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夏朝大约存在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之间，是一个有着多个部落联盟或

① 陈炎：《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②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复杂酋邦制度的国家。它的核心区域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处，属于黄河中游地区。考古学上的河南二里头文化被视为夏代遗存的重要标志，这一区域的出土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属于早期青铜时代。<sup>①</sup> 这一时期夏后氏的中央王室与十一支姒姓部落之间有着血缘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多重关系。

马克思曾经指出：“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sup>②</sup> 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角度上看，与希腊文明这一“正常的儿童”相比，华夏文明只能算是“早熟的儿童”。因为早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时代”，西方人已经发明了铁器。而我国的夏、商和西周时代，非但没有铁制的生产工具，就连青铜的冶炼也主要用于礼器和兵器的制造。正像张光直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在青铜时代开始之前与之后的主要农具都是耒耜、石锄和石镰。没有任何资料表示那社会上的变化是从技术上引起来的”<sup>③</sup>。既然没有生产技术的历史性突变，作为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早期的国家制度又是怎样出现的呢？这大概与我们的祖先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

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经提出过“挑战与应战”的著名观点。按照这一观点，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对于“挑战”的“应战”。所谓“挑战”，就是外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向人们提出了一些不容回避的历史课题；而所谓“应战”，就是人们在这些课题的要求下调动主观能动性而产生的文化对策。因此，每一次“应战”的成功，都会导致一种文化模式的出现或变革；而每一次“应战”的失败，都会导致一种文化模式的衰亡或破产。我们知道，今天的巴尔干半岛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适于农业生产。要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拓荒耕作，希腊人就必须发明坚硬的铁质农具；而为了在较少的土地上养活较多的人口，希腊人就必须去漂洋过海，从事远洋贸易。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私有财产；另一方面，远洋贸易的活动又破坏了血缘关系。于是，当原有的氏族血缘关系瓦解后，为了约束自由民的肉体行为，希腊人不得不在坚硬的海岛上建立起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政权；而为了凝聚自由民的精神寄托，希腊人又不得不在虚幻的奥林波斯山上建立起超越血缘的神学体系。于是，作为对自然“挑战”的社会“应战”，希腊文明诞生了。

与希腊文明不同，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既不需要发明坚硬的铁制农具去耕耘贫瘠的土地，也不需要为了远洋贸易去进行海外移民。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一、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③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8页。

的冲积平原两大特点：一是其松软的土壤为铁质农具发明以前的古代先民们提供了耕作的可能性，二是其频繁的洪涝又使得人们必须建立大规模的社会组织才能加以治理。“根据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所提供的证据表明，在距今4600至4000年之间，黄河经由豫东南、淮北平原、苏北平原的淮河一线入海；夏商周三代，黄河又改道河北平原入海。而尧舜禹时期正是黄河由南线入海改道为由北线入海的时期。当时的河水泛滥成灾特别严重，周秦文献里有许多这方面的记录。”<sup>①</sup>《尚书·尧典》记载当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上》也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禹疏九河，濬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我们知道，治理黄河的工作可不是少数人所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个部落群体能单独胜任的，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高度的社会组织结构。这种活动，显然为早熟的国家创造了条件。作为夏后氏部落的首领，夏代的创始人禹联合其他部落一同疏浚河道，并在这一过程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整合了其他部落，从而将部落联盟演变为国家制度，致使他的儿子启废除了部落首领靠选举、禅让而产生的原始制度，最终建立起以血缘沿袭王位的国家政权，从而使中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集团过早地诞生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1857-1858年）中谈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时曾经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上占有的公共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到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sup>②</sup>在此基础上，美籍德裔学者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提出了饱受争议而又影响深远的“治水社会”说。他指出：“如果灌溉耕作取决于有效地管理大量的水源供应，那么水的明显的特性——大量聚集——就在制度上变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了。只有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才能疏导和储积大量的水，而这大量的劳动力还必须进行协调，赋予纪律和加以领导。因此，许多迫切希望征服干旱低地和平原的农民只好被迫采用组织手段，而在机器时代以前的技术基础上，这些手段只有一个成功的机会：他们必须与同伴合作，并使自己服从于一个进行指挥的权威力量。”<sup>③</sup>于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乃至文化形态出现了。“一个已知的治水经济中空间上（和组织上）结合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它的用水供应是否联成一气。治水国家在只有一个主要水源地区倾向于建立一个单一的或多或少连接在一起的灌溉和防洪体系。”<sup>④</sup>从考古学的角度上看，我国南北东西各地都有许多早期文化的历

① 江林昌：《夏代早期国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考古发现与文史新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74页。

③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④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史遗存，但文明的突变却发生在黄河流域，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面对如此庞大的天然水系，必须建立起庞大的社会组织；而庞大的社会组织不仅可以发挥治水功能，还可以兼并其他的周边地区。因为治水地区不仅具有自然资源上的优势，而且具有社会组织上的优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出现了。

由于夏王朝是先民们针对黄河流域自然环境严峻“挑战”而做出的“应战”结果，这便决定了早熟的中华民族注重宗族血缘的文化特征。我们知道，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类最初的社会群体都是由血缘组成的。然而在从原始部落向国家形态演进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人们所面临的条件不同，血缘关系的变化也不同。由于古希腊的商业交易和海外移民逐渐打破了原始的血缘纽带，从而形成了以公民个体为基础的早期共和制国家。而古中国的缔造者却必须在具有竞争关系的部落之间发展壮大自己，通过强化血缘内部的凝聚力而在众多的部落之中脱颖而出，成为部落联盟的共主。在这种情况下，原始的血缘关系不仅没有被破坏，反而被不断地加强了。见于《竹书纪年》《史记》《国语》等古籍中的少量资料表明，夏王朝不仅开创性地采取了以血缘来继承最高统治地位的制度性安排，而且以保存完好的姒姓部落为新型国家的统治基础。当然了，尽管十一支姒姓部落在国家政权的整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血缘关系的范围还是有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 2071 年，夏商之交为公元前 1600 年，在这 471 年夏代的历史阶段中，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实际上仍然处于部落联合体的状态，各个部落都以血缘为单位自行管理。其中夏部落率先建立了国家机器，步入文明时代，因其强大、影响深远，而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共主。这共主的威力只能对联合体中的其他部落产生外在的影响，而无法渗透到其内部，因为各部落内部仍然实行其本族的血缘管理。”<sup>①</sup>

总之，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尽管夏朝草创了华夏式国家的基本模式，但其制度并不完备，基础并不牢固。单从帝位的传承来看，在启之后即有太康失国的纷乱，说明夏与其他部族之间仍然处在激烈的争斗中，夏朝内部的权力继承还没有稳定的制度保障。夏要压制其他部落就需要有足够的实力不断征伐，传说中的九夷部落就曾成为夏的主要对手。而夏朝本身也需要在与各部斗争中保持自己的强势地位，一旦实力不济就会造成王朝权力的旁落。《汲冢纪年》云：“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说明夏在王权统治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过断裂失位的情况，这也从侧面说明夏朝的国家形式还很不稳固，它所确立的血缘制度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华夏文明的第一个王朝，夏代并没有用新的国家机器来取代旧的血缘关系，而

<sup>①</sup> 江林昌：《文献所见夏民族的活动范围与考古学上对夏文化的探索》，《考古发现与文史新证》，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128 页。

是借助于旧的血缘关系形成新的政治制度。这一特点对中国文化日后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二

由于有了甲骨文的发现，我们对商代的了解似乎比夏代详细了许多。然而，一来甲骨文是商代后期才出现的文字，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大多反映盘庚迁殷至纣王间270年间的历史，对商代早期生活的记载不多；二来甲骨文本为卜辞，绝大多数是记录占卜活动的文字，对整个社会的描述不全。然而无论如何，结合后代的文献传说和出土文物，我们对商代的了解毕竟比夏代详尽多了。

早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商作为一个部族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商的始祖契原本领导着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东方部落，后因帮助夏朝的创始人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制过渡。“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商取代夏而成为中原联盟共主的时间约为公元前1556年，至公元前1046年被周所灭，共510年。在这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商曾多次迁都，都城中的多个均在河南境内。考古学家在河南的安阳市发现了出土甲骨文的殷墟，在商丘市、郑州市、偃师市、温县、辉县、新郑市等许多地方也发现商朝文化遗存。这些遗存表明，商朝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发展都比较快，青铜器的冶炼与制造技术相当成熟。商朝的势力范围也要比夏朝大得多，不仅包括黄河流域，而且波及长江流域。

从生产方式的角度上讲，商人大约经历了一个由畜牧业到农业的发展过程。“周灭殷，称商人为夷。……夷字从大，从弓，从弓就是表示他们善于射猎之意。龙山文化是夷族的文化，所以他出土的箭镞比仰韶文化中多得多，而且种类也很多。”<sup>①</sup> 甲骨文中就有狩猎的“狩”字，其字形很像捕兽之物与被捕之兽。与狩猎相联系，商人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徐中舒指出：“畜牧在殷商也是普遍的。马、牛、羊、鸡、犬、豕六畜和象都有，而且都是家畜。”<sup>②</sup> 杨升南认为：“畜牧业在商代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其标志是它已作为当时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sup>③</sup> 我们知道，从事畜牧业的人要逐草而生，“而商人之所以屡迁，正与他们仍处于游牧流动生活有关”<sup>④</sup>。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商人的农业生产渐渐取代了畜牧业的地位。据1929-1932年所发掘的

① 徐中舒：《徐中舒先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② 徐中舒：《徐中舒先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③ 杨升南：《商代经济与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页。

④ 江林昌：《商族先公的起源与相关史事》，《考古发现与文史新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5页。

安阳殷墟的7处灰坑统计，出土石镰达3640件，其中一个灰坑即有444件。<sup>①</sup>在农业社会中雨量的多寡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因而甲骨文中记录了大量占卜求雨的事件，甚至多次为求雨而焚人。从维系血缘关系的角度上看，守土重迁的农业生产显然要比不断迁徙的畜牧业生产更加有利于血缘关系的稳定。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上讲，商朝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游动为主的氏族联盟向以城邑为中心的方国制度发展的过程。殷人的都邑，是经过多次迁徙的。王国维在《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一文中论证自契至于成汤，都邑迁徙过八次的过程。张守节在《史记·殷本纪》的《正义》中说：“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隰，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说明成汤以后又迁徙了五次。从时间上来看，前八次迁徙所占的时间短，后五次迁徙所占的时间长，这说明农业生产有一些发展，用不着通过频繁的迁徙来改变地理条件了。而到了商代后期，商王朝最终稳定了下来，形成了以殷墟为核心的权力辐射地带。“这时，方国联盟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商民族居于‘中商’‘大邑商’之内，成了方国联盟的真正共主。而且在行政上，出现了地域管理的观念。商族称商王与贵族所居的‘中商’‘大邑商’为内服，而‘中商’以外的广大地区，按亲疏关系分为侯、甸、男、卫、邦伯五个层次，合称外服。”<sup>②</sup>这种地域与血缘同形同构的关系，为以后西周的分封授土授民制度奠定了基础。

从权力更迭的角度上讲，商民族的统治者有着连续的血缘承续系统，而不像夏王朝那样出现过“有王与无王”的混乱局面，但是商王朝的血缘承续又有着一个从“兄终弟及”到“父死子继”的演变过程。我们知道，甲骨卜辞记载的商王共29位，其承续系统与《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31位大体一致。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特如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外丙、中壬、大庚、雍己、大戊、外壬、河亶甲、沃甲、南庚、盘庚、大辛、小乙、祖甲、庚丁）；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廩辛、武乙）。惟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阳甲立：此三事独与商人继统法不合。”后人据此进一步分析，商朝前期与后期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商朝的前期，王位传承采取“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两种方式，“兄终弟及”甚至还略占上风；商代后期，自康丁（庚丁）开始不再采取“兄终弟及”的方式，而只采用“父死子继”的方式，直至商代灭亡。有学者推测，“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可能与早期商人与北方有娥族实行“普那鲁亚婚”有关。在这种婚姻制度下，兄弟共妻对方氏族的姐妹，姐妹共夫对方氏族的兄

① 石璋如：《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第723页。

② 江林昌：《商族先公的起源与相关史事》，《考古发现与文史新证》，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3页。